

“一苏大会”在瑞金召开



“一苏大会”旧址。(资料图片)

1930年1月上旬,共产国际远东局向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全国各苏区代表大会”。1930年5月23日召开的全国苏代会主席团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在1930年11月7日召开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革命的指挥力量,统一全国各苏区的政权和法令。

但当时由于环境险恶,“一苏大会”筹备工作一度停顿,召开时间一再延期。而共产国际对此甚感不爽,不断敦促尽快召开“一苏大会”,远东局直接起草大会主要法律文件。在

共产国际的敦促下,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于1931年9月20日作出决议,“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各苏区届时选派代表参加中央苏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是,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等各苏区及红军各部均选派代表出席,共610人参加。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人与劳动民众》。大会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此次部署是:以陈诚指挥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16万余人为中路军,分3个纵队,担任主攻任务;以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和驻闽部队为左路军,以余汉谋指挥的广东部队为右路军,负责就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

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江西“剿共”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约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下,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国民党军,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城和南丰。2月9日,红军开始向南丰地区开进。南丰城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有5个团防守。12日晚,红军第三、第五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战斗中,红3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鳌牺牲。

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令守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驻南城的第二十四师驰援,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发觉南城国民党军增援,当即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主力转移至南丰、里塔坪以西地区,准备打援。22日,红一方面军获悉中路军第一纵队准备由宜黄、乐安地区增援南丰,第二纵队主力集中于南城,企图在第三纵队策应下,与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周恩来、朱德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无胜利把握,在南丰地区与之决战更为不利,遂决定撤回南丰,诱敌深入苏区。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新丰和里塔坪之间东渡抚河,将中路军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方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待机。陈诚被红十一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遂以第一纵队于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第二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据此,第一纵队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准备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十一师会合。

26日,红军各部先后进入预定地域。26日,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27日,第五十二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前进;第五十九师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均较困难。当时细雨浓雾,能见度差。第五十二师因受红军游击队袭扰,行动缓慢,加之误认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对隐蔽在其行进道路南侧高地之红军主力毫无察觉。13时,当第五十二师前卫第一五四旅进至桥头附近,后卫第一五四旅第三〇九团越过登仙桥时,红一军团以一部兵力向蛟湖攻击,将第五十二师行军纵队拦腰切断;主力向大龙坪、小龙坪发起猛攻;红二十一军也迅速赶到登仙桥附近地区,截断了该师退路。经3小时激战,全歼第五十二师师部和第一五四旅第三〇九团,俘师长李明。取道大龙坪、坪口、跃龙坪向黄陂前进之第一五四旅1个团,也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

红一方面军鉴于中路军第一纵队同第二、第三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且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黄陂开进所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红军大兵团伏击,决定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战求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部署是: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隐蔽集结于金竹、大坪地区,待第五十二师进入蛟湖、桥头一线时,突然发起攻击;以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隐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今霍沅)地区,歼灭由固岗、西源(今西沅)向黄陂前进的第五十九师,并保障左翼队翼侧安全;以江西军区独立第四、第五师分别在永兴桥至杨坊之线和河口西北上源、下源地区活动,牵制第十一师,并保障右翼队翼侧安全;以红十二军为预备队。

第一五四旅得知大龙坪和黄陂方向发生战斗后,即就地转入防御。18时,红三军团主力赶到,将第一五四旅主力合围于桥头,28日上午将其歼灭。与此同时,红三、红一军团各一部协同作战,全歼第一五四旅主力于蛟湖。红军右翼队先头部队于27日11时进到黄陂、秀源一

线,发现第五十九师正从霍源一带向黄陂前进。右翼队即以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向霍源方向急进,先机占领黄陂西北一带高地,红十五军在霍源以南占领阵地,求歼第五十九师于黄陂、霍源地区。13时,红十五军同第五十九师前卫部队接战,将其击溃。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第三五一团主力和独立团在西源地区就地转入防御,第一七五旅主力向前增援,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28日上午,红军右翼队向第五十九师发起全线进攻,经整日战斗,将该师主力大部歼灭,师长率残部数百人向蛟湖方向突围,企图同第五十二师会合,当其发现第五十二师已被红军歼灭后,又转向乐安方向逃窜。3月1日上午,该部被红一军团歼灭于登仙桥附近,师长陈时骥被俘。至此,第五十九师除在西源地区1个多团逃脱外全部被歼。在战斗中,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牺牲。

第五十九师主力被歼后,第一纵队第十一师主力已到达河口、南源地区。红军准备乘胜继续围歼该部,但因第二、第三纵队兼程来援,再战于红军不利,红一方面军当即决定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黄陂战斗后,国民党军中路军集中在黄陂、蛟湖地区搜寻红军主力。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仍不知红军去向。3月中旬,陈诚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三纵队第六师守备抚州,第七十九师在宜黄地区为预备队。周恩来、朱德获悉中路军向广昌进攻的企图后,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以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开展活动,摆出要保卫广昌的姿态,吸引中路军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其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同时率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中路军后纵队。陈诚误认为红十一军是红军主力,意在保卫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第五师配属前纵队指挥。

20日,中路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第五十九师残部相继跟进,第九师进至东陂附近,两纵队相距已近50公里。红一方面军总部抓住这一极为有利的战机,决定集中优势兵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红军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抗日宣言、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红军优待条例、婚姻条例等法律、法令、条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构。

如今,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因年代久远,传世稀少。江西省文博单位收藏有“一苏大”代表证,以红绸布加工而成,正面为泛黄五角星图案,其上中央是“代表证”三字,上有弧形排列、从左至右“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七个红色繁体字。

“毛主席”的称呼是如何来的?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任弼时随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坐,会议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大会主持人任弼时在大会上第一次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并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毛主席提笔书写了:“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主席的题词使参加大会代表们激动万分,大家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从此“毛主席”这个称呼诞生了,自此传扬世界。

由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挥的第二次军事“围剿”,比鲁涤平指挥的第一次“围剿”败得更惨。于是,蒋介石恼羞成怒,在责骂部下无能的同时,决定亲自出马,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叫嚷“于最短期间,清除‘共祸’”,发誓将“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表示若“剿匪”成功,他将“解甲归田”等等。6月21日,蒋介石到南昌。25日,任命了各路“剿匪”军头目,并自任总司令。26日,他前往豫章公园中山纪念堂悼念被红军打成重伤死去的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并在南昌行营宴请各路“剿匪”军将领,以励士气。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23个师3个旅共30万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共约3万人,仍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3个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1个师在南丰以南地区,协同地方武装迟滞国民党军前进;主力于7月10日前后由闽西、闽西北、闽赣边和赣南等地迅速向苏区中心区集中,完成回师的任务。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县城西北的高兴圩地区。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分路向兴国进逼,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3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富田前进时,发现国民党军两个师已先到富田,随即于8月4日折返高兴圩地区。此时,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西有赣江,南、北、东三面有国民党军9个师逼近。

红一方面军遂以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将“围剿”的国民党军主力7个师吸引到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红军主力则于5日晚从兴国江背洞、崇贤圩两地国民党军防线之间40里地的间隙中隐蔽向东急进。7日,红军主力于莲塘全歼战斗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2个旅又1个多营。接着又于良村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师部和两个旅的大部。11日,红军在黄陂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师两个团。随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君埠以东的君岭脑山区休整。

莲塘、良村、黄陂战斗后,国民党军始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东进,即将所部掉头往东,于12日至15日,以密集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8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以一部兵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东北方向;主力于16日夜秘密从东进的国民党军第一军团和第二路军之间20华里间隙地区疾进,跳出合围圈,回到兴国东北的枫边、白石地区休整。待国民党军发觉红军主力再回头西进寻找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时,红军已休整近半月,并继续西移到兴国、万安、泰和等地隐蔽待机。此时,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士气低落,不得不下令总退却。红军乘胜追击。9月7日,在老营盘歼灭由兴国北撤的国民党军蒋鼎文第九师3个团,并在高兴圩重创其第六十、第六十一师。15日,红军又在方石岭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1个多团。

至此,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经过三次反“围剿”的斗争,红军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作战原则。

第一所红军医校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后,由贺诚主持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获准。

1931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朱坊村宣告成立,贺诚兼任校长。建校伊始,毛泽东就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在当时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学生也不忘艰苦奋斗,师生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不忘提高思想觉悟。

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6月,因彭龙伯调任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部长,校长由陈义厚接任。8月,红军卫生学校搬迁至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与同年3月从福建汀州迁来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仍冠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校驻瑞金叶坪朱坊村,隔河与洋江下的中央红色医院相望,并与红军总卫生部邻近。

据了解,从学校创办到长征前,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共培养军医班学员181名、调剂班学员75名、看护班学员300名、保健班学员123名,总计679名。

长征时期,卫校师生随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两过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不仅边行军、边办学,还担任救护工作。据史料考证,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办学的学校。

1937年,红军卫生学校进入延安。1940年9月,经毛泽东同志提议,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苏区时期一所重要的医务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医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培养的大批医务人员奔赴于中央苏区的各个战场,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红军卫生学校不仅是人民军队医务学校的摇篮,而且为后来我国医学院校的建立和医学教育的开展树立了典范,其在实践中凝炼的办学精神成为新中国医学院校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